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兰州党史资料汇集

(六)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史略

-兰州市文化局、兰州“八办”纪念馆（1）
- 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伍修权（45）
- 谢老在兰州.....王定国（54）
-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建立经过及其任务.....况步才（63）
- 回忆在谢老直接指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吴 渤（68）
- 回忆谢老三次亲切会见.....杨干丞（73）

谢觉哉同志的文章选载

- 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敦 夫（75）
- 争取日军阀压迫下的人民.....敦（77）
- 阎锡山先生抗战的决心.....明 远（80）
- 苏联是我们的朋友.....佳 金（81）
- 读贺主席入党训词.....无 奇（83）
- 重来一次认识.....忠 理（85）
- 从开城门想到做工事.....见 心（87）
- “不良分子”的界说.....明 远（88）
- 所谓“政治背景”.....无 奇（90）

猎手宜于游击战·····	见 心 (91)
三民主义与反战纲领·····	明 远 (92)
冷, 努力办皮衣·····	佳 金 (94)
鲁迅的话·····	见 心 (95)
祝妇女旬刊的诞生·····	谢觉斋 (96)
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	谢觉斋 (97)
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	觉 斋 (99)
怎样组织委员会·····	实 之 (101)
有苦说不出·····	忠 理 (102)
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	金 (103)
三民主义与抗日救亡·····	雪 朗 (105)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史略

兰州市文化局、兰州“八办”纪念馆

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甘肃，建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八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办事机构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由于它设在兰州，习惯上也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从建立到撤销，历时六年零五个月时间，根据其工作发展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九月，是办事处开展工作的准备时期。这时国共合作宣言还没有公布，国民党甘肃当局对办事处表面上敷衍应付，暗地里监视刁难。因此，办事处的中心任务是：站稳脚跟，为在甘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办事处工作胜利发展时期。这期间，办事处在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同志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党的洛川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亡运动、营救西路军等各项工作得到全面的蓬勃发展。

第三阶段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是办事处逐步收缩、撤销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甘肃当局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办事处在反共逆流中，坚持与苏联保持联

系，接待和保护我党的过往人员，掩护地下党的工作，直到撤销。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对甘肃的革命斗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第一部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建立（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九月）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们东北。一九三五年又强占华北。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威胁下，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党的号召之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使蒋介石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反革命政策遭到严重打击，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热情却受到了极大鼓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但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且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为首的西北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遭到他的拒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赴西安与张、杨协商，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天，党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

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七月十五日，我党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八月二十日，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领导抗日，争取胜利，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主张，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我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蒋介石也被迫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全面抗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南京、西安、兰州、太原、重庆、桂林、长沙、乌鲁木齐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在重要城市如西安、武汉、重庆、长沙、兰州等地，还派驻了党中央的代表。

兰州办事处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已经开始建立。它建立较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营救渡过黄河西征而在河西失败的红四方面军人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共二万余人在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甘北挺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结果在河西走廊遭到失败。西路军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四百余人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的率领下到达了新疆。其余，或被俘虏，或流落河西各地。饥寒交迫，时遭残杀。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怀，除

及时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到新疆迎接李先念余部外，并通过各种途径，对关押和流落在甘、青一带的西路军人员进行营救。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西安解决“双十二事变”的周恩来同志，委托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的马德涵先生到武威与马步青作初步接触。三月，张文彬、刘秉琳二同志携带周恩来同志写给国民党高级将领、护送班禅进藏专使赵守钰先生的亲笔信，到西宁、武威等地，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并通过赵守钰先生与马步芳谈判释放被俘红军问题。四月下旬，张文彬同志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兰州拱星墩集中营看望了被俘红军，在兰州时。他根据吴波同志的推荐，就去河西营救西路军问题和在兰州设立办事处问题，与高金城同志交换了意见。五月，张文彬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派吴鸿宾同志去青海了解被俘红军的处境和待遇情况。除了通过上述途径与二马谈判交涉外，党中央决定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从事营救和收容西路军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为营救西路军问题在西安接见吴鸿宾时，就曾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不久，党中央抽调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彭加伦同志开始筹备。五月二十七日，来兰州建立办事处的七位同志，都换上便服，在张文彬、彭加伦同志的率领下，从西安出发，于二十九日到达兰州。初来时，住在中央广场陇海大旅社。十天后，迁到南滩街五十四号（今互助巷二号）前院办公。这时的办事处是我党设在甘肃的一个半公开机构，对外称“彭公馆”。

办事处建立之后，初期的分工是：负责人张文彬、彭加伦；秘书朱良才；副官况步才；译电员黄文彬；警卫员王大成、刘富秀。不久，张文彬同志奉命调回延安。“七七”事变后，党为了加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大革命时期，党曾派谢觉哉同志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贺耀祖那里去做工作，争取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这段历史，决定再次派谢觉哉同志到兰州做争取贺耀祖的工作。于是，谢觉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从延安来到了兰州。八月，随着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办事处正式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同志任党中央和毛泽东代表，彭加伦同志任处长。除谢老外，其余人员都换上了军装，佩带军衔和符号，以八路军的军人身份出现于各个场合。从此，办事处成为我党我军设在甘肃的一个公开合法机构开始了工作。九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

一九三七年五月到九月，是办事处全面开展工作的准备阶段。这时，处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共合作宣言还没有公布。甘肃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迫于“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压力，不得不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又由于国民党中央没有合作明令，因而，不敢在与共产党在交往中走得过快。加上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长期的对立，他们之中不少人对共产党还深怀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以贺耀祖为首的甘肃省当局对办事处的态度，就不可避免地处于既想合作又严加戒备的矛盾状态之中。办事处成立初期，他们表面上虚为应付，暗地里监视刁难。贺耀祖不给办事处发护照和手令，使办事处只能在半公开半合法的状态下工作。他们在和办事处的交往中，深怕扩大我党的影响，常常深夜到办事处来，把汽车停到隔壁，用掩耳盗铃的方法，表示他们与办事处没有关系。伪警察局长马志超，是军统特务、法西斯负责人，十分反动。对办事处的行动非常注意。他以守卫保护为名，派警察站岗监

视办事处，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办事处去看望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要求。谢觉哉同志来兰后，曾多次向贺耀祖提出开放民运、改革政治、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等问题，但都以合作宣言没有发表为借口而搁置起来。这些是来自上层的困难。

在基层，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也比较差。由于甘肃长期处于反动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之下，革命思想不易传播。因此，甘肃人民虽然有反抗精神，但因缺乏先进思想作指导，斗争常遭失败。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甘肃进行了革命活动，建立了党的组织。可是，在反动派的镇压下，都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办事处开始建立时，没有党的地下组织，也没有找到一个党员。这样，办事处既要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又要帮助建立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十分艰巨的。

针对以上情况，办事处采取的工作步骤是：第一步，站定脚跟、扩大党的影响，与国民党甘肃省当局解决合作问题；第二步，与各方面广泛接触，争取同情者，逐步深入下层，开始与省政府当局讨论各项问题；第三步，推动上层政治改革，领导同情者，建立各方面的工作关系。由于办事处采取了正确的工作步骤，充分利用有利因素，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所以，终于站稳了脚跟，迅速打开了局面，为全面开展工作准备好了条件。

办事处建立初期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甘肃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办事处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对甘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了解。甘肃人民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层层剥削和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全省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年不

断。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严厉统治，先进思想很难传入，所以，受革命的影响很少，斗争比较孤立。对政治比较敏感的青年学生，在反动势力的控制下，每天只是埋头读书，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们的本质是好的，勤俭用功，有强烈的爱国心，积极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措施极不满意。女师两个学生就是出于救国热情，女扮男装投奔前方抗日去的。

在党政军上层人士中，甘肃省主席贺耀祖比较开明。但他有许多歪道理，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真理，不能实现。他希望将来社会的变化，不是三民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这种观点说明，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对于抗日，他认为日本技术太高，中国事事落后，是不能胜利的。但他主张抵抗，抵抗了，虽亡国也无遗憾。他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先进技术的作用，产生了失败的情绪。但是，他还有民族气节，愿意抗日。新一军军长邓宝珊态度最好，过去反动时期，同情我们，没有加害过我们的同志，并且保护了许多人。但是，说的多，做的少，渐渐失去部下和群众的信仰。公安局长马志超，是甘肃法西斯的总负责人，与军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共同派特务监视办事处的行动，最为反动。

在军队中，甘肃驻军有中央的嫡系部队四十三师、九十七师和胡宗南的补充旅，还有地方的杂牌部队邓宝珊的新一军和鲁大昌的一个师。他们之间互有矛盾，既有黄埔系与保定系、法西斯与C.C的矛盾，也有地方军和中央军的矛盾。而地方军受中央军的排挤打击，因此，是可以争取的。

这些基本情况的调查是办事处工作决策的基础。

第二，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对甘肃社会基本情况的分析，办事处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工作中，把在军政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做为重点争取对象，推动他们转向进步。在办事处刚成立时，贺耀祖的态度不甚好，认为共产党无存在的必要，甚至还训斥张文彬、彭加伦同志参加革命是走到“邪路”上去了。后来，在日本不断加紧进攻，时局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经过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多次向他解释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并针对他恐日的心理，指出“日寇兵力虽较我强，然其他条件皆我优而彼绌”、“不在日寇之凶强，而在吾人抗战决心之不足”。使他逐渐认识到动员民众抗战的必要，而且为此产生了焦急感。针对这种情况，谢老又及时提出了许多动员抗日的具体措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贺耀祖公开召集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马愚忱、田昆山、田炯锦、戴愧生等人欢宴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宴后进行座谈，讨论了办事处提出的开放民运问题、军队整顿问题，以及甘、宁、青、新的团结问题。他们一致同意办事处的意见。贺耀祖还要求办事处贡献民运方面的经验。这次会见比较成功，打开了在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办事处在争取贺耀祖的同时，还做了对邓宝珊的争取工作。邓宝珊比贺耀祖的政治眼光远大一些，对办事处表示最好，思想比较进步，但在合作宣言发表前，表现迟疑，不够大胆。为了团结争取他，谢觉哉同志曾多次与他会晤交谈，他表示接受办事处的提议，在省府会议上为争取民主民运作努力。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办事处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谢觉哉同志曾指示吴鸿宾同志拟定回族问题的具体方案，转送贺耀祖。谢、彭在国民党省党部宴请他们时，又向贺提出了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

团结少数民族中优秀分子的问题。办事处和甘肃的回族上层人士也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如对曾任青海省民政厅长的马凤图和当时任甘肃政府参议的马公章等人所做的工作，使他们明白了我党的抗日主张，表示赞成和佩服。有的甚至准备召集旧部参加抗日，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办事处还通过青海民和县长马腾云、大通县长刘希古和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分别对马步芳、马鸿逵进行了争取。对额济纳旗的蒙古族图王，办事处曾派周祥生同志去争取他抗日。办事处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推进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三，疏通关系，配备力量，为营救和收容西路军人员准备条件。

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侥幸生存下来的同志，不断遭到追捕和杀害。为了及早营救他们回到革命队伍，张文彬和彭加伦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就曾与贺耀祖会谈过三次，与公安局长马志超、九十七师副师长也各会谈过一次。但是他们不允许到河西去收容。被俘红军开到兰州，他们不告诉办事处，或者告诉后就马上开走。所以，初期的营救和收容工作很难开展。谢觉哉同志到兰州后，多次与贺耀祖交涉，并根据吴鸿宾同志的调查，将被俘红军的分布情况写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这样，从青海要回了几名干部和十几名工人。办事处还根据中央的电报和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列出名单，向负责西路军被俘人员集中编遣工作的国民党九十七师交涉要回了何兰阶、陈凤祥、王文生等人。从河西流落来兰的红军中，也零星收容了一些人员。对收容来的伤病员，都发了钱，送进省立兰州医院治疗。谢老、彭加伦、朱良才、况步才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常到医院看望、慰问，使他们感到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温暖。

当时，河西有大批红军流落在城镇和乡村，急需派人到那里去收容。但是，河西是马步芳、马步青的防地，统治很严，没有适当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作掩护，是很难开展工作的。在兰州开设福陇医院的院长高金城同志是这项工作最适当的人选。

高金城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是党的早期的同情者和拥护者。早年曾任冯玉祥西北军伤兵医院院长和协和医院大夫。“一二八”事变，他出于民族义愤，参加上海战地医疗队，救护伤员。一九三二年来甘肃，先后在张掖开设福音堂医院，在兰州开设福陇医院，致力于“济贫救人”。一九三六年，随赵守钰先生护送班禅进藏的吴波同志，曾在福陇医院住院，他和高金城同志是老相识。一九三七年二月，南汉宸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电告吴波，要他推荐一位去河西收容红军的适当人选。吴波同志考虑到高金城既是大夫，又是基督教牧师，在张掖开过福音堂医院，还有教堂。而且他又善于交朋友，在上层和下层人士中均有影响，各方面认识的人很多，政治上又很可靠。有他这样的身份做掩护，是最理想不过的。因此，作了推荐。一九三七年四月，张文彬同志到兰州看望红军时，就和他进行了初步商谈。五月，办事处成立，高金城同志慷慨相助，把医院的桌、椅、病床等送给办事处使用。八月一日，谢觉哉、彭加伦、朱良才等领导同志和他在五泉山详细地研究了去河西营救的具体办法，他欣然接受了党的重托，在当月的八日（阴历七月初三）就到达了张掖。到张掖后，他和流落红军的地下党支部很快取得了联系，开始了营救和收容红军的工作。

办事处建立初期，传播了党的政策和主张，推动了以贺耀组为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营救、

收容西路军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为全面开展工作，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准备了条件。

第二部分，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

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政策。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会议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斗争方向。

国民党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内外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的侵略，损害了它的利益，在人民的压力下，表示要抗日。但是，它又害怕共产党力量的成长，反对人民起来抗日。

办事处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的变化，认真贯彻洛川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战的胜利。对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的反动行为和措施，则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十月，苏联派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百余空军人员来兰，并设立军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办事处和他们的接触逐渐增多。因而，谢觉哉和彭加伦同志电请中央，要求驻兰代表改派“能俄语者”。于是，伍修权同志化名吴寿泉，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来兰，接替彭加伦同志任处长。二月十三日，为了适应工作日益发展的需要，办事处从南滩街五十四号迁孝友街三十二号（今酒泉路一百二十七号）办公。九月，谢觉哉同志返回延安。办事处在伍修权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甘肃省政府也进行了人事改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朱绍良接任甘肃省主席。他上任后，逐步推行反共政策。办事处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不得不与他的反共行为作斗争。

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办事处的工作蓬勃发展时期，它的主要任务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期间，它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和八路军办事处积极争取下，以贺耀祖为首的国民党省政府，有了进步的变化。办事处可以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了，能够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做一些改革了。谢觉哉同志对甘肃的抗战动员、革新政治等问题，向贺耀祖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开展民运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提出了不怀疑民运，不限制民运，扶植和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打击那些反对自由的派别和观点；在军事、交通、民族政策及民生、经济等问题上，建议采取大刀阔斧、壁垒一新的办法，以应付猝至之外祸。在教育改革上，提出了学校教育应以国难为中心，学校与社会合一，理论与实践合一，于实际运动中增进学生才识。并建议改革政府工作方式，多做实际工作，少搞等因奉此。在两党合作抗日方面，提出了在共同纲领之下，互相协助，互相规勉。尽管贺耀祖优柔寡断，缺少作为，见诸施行的很少，但对办事处的建议都表示了对尊重和接受。因此，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办事处的工作得到了全面发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贺耀祖去职，朱绍良任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人事有了变动。办事处原来建立的统战关系受到影响。朱绍良要比贺耀祖反动得多。初来时，尚有撤销办事处及组织暗杀团的谣言，并且对陕西省党部关于“发动民众团体联名电中央反对边区”的密电批准照办。虽然朱绍良非常反动，办事处还是采

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都和他进行过多次交谈。谢老还发表了《怎样才能产生贤明政府》、《怎样组织委员会》、《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等许多文章，希望他摒去党派成见，登用各党派各民众团体有威望的人参加政府领导工作，以改革和刷新政治，但都没有得到他的采纳。原来在贺耀组时期争取到的一点民主权利，也在“抗战时期，不容许有分歧现象”的借口下而被取消了。当时，只是由于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深得人心，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节节胜利，开辟了大片根据地，才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暂时勉强维持团结友好的局面。

办事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阐明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个人。当时，甘肃省府官员中也有一些较为开明的或与我党有些历史关系的，如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是比较开明的，民政厅长施奎令是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大学时的同学。一九三九年周恩来总理赴苏治病时，路过兰州，曾会见过他。甘肃省参议杨干丞比较接近我们，曾推荐他的旧部、青年军官五人到抗大学习。一九三八年春，谢老还安排他到延安去参观。此外，第八战区参谋长章亮琛、国民党中央驻兰州的外交特派员李铁静等和办事处都有来往。办事处和地方士绅，如张维、水梓等也有接触。一九三八年三月，孙静功等人在农民银行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邀请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参加。谢老和伍修权同志开会必到，到必发表演说，利用这个讲坛，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使与会青年大受教育。虽然兰衣社分子十分恼火，甚至要拿枪来打，但是，因为讲的都是真理，他们无法反驳，只好采取延期或休会的办法进行拖延。办事处与《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也有较好的关系。他们的编辑常到办事处向谢老求教。谢老和彭加伦同志也常在这两个报纸上

发表文章。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谢老针对甘肃时弊，以觉斋、敦夫、佳金、无奇、明远、忠理、见心等十余个笔名，发表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文章七十余篇，在甘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军队中，团结争取了新一军军长邓宝珊。邓宝珊与办事处的关系比较好，赞成办事处提出的各项改革意见。邓部杜汉三团长，思想进步，与办事处关系密切，常和谢老、彭加伦、伍修权同志来往。曾邀请彭加伦同志到该团向官兵讲过话。杜汉三还要求办事处派人到该团做政治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根据办事处的报告，派雷明同志以少校政治教官的身份到该团工作。但因雷明和杜汉三过于性急，把雷公开了。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对该部的注意和防范。一九三八年秋，办事处又派共产党员黄俊耀等同志到该团做宣传工作。但不久，朱绍良以解决粮饷为名，将杜汉三诱至兰州，撤销了他的职务，软禁起来，并派特务分子付子赉接替了团长职务。于是，该团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纷纷离去，统战工作受到了破坏。办事处与蒋云台旅和国民党九十七师也有联系，曾争取九十七师释放了一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

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办事处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办事处代表党中央在和国民党甘肃省当局讲统一战线时，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人民参加抗日的问题上。办事处坚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甘肃国民党当局与此相反，害怕人民起来抗日，对群众救亡运动施行打击和压制。抗战初期，当抗日救亡团体刚要成立时，国民党就造出谣言，派人进去破坏，找出头组织的人谈话加以威胁，或者以派指导员的名义操纵监视。这样，有些抗日群众团体还没有组